



绿色星河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长 城 飞 虹





长城飞虹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城飞虹/胡世宗等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9
(绿色星河丛书)

ISBN 7-5033-0905-9

I . 长… II . 胡… III .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 42 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125

274 千字 印数：1—1000

定价：13.30 元（膜）

出版说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着优良传统的队伍，90年代以来，具有跨世纪军人素质的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群体更是层出不穷。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江主席关于“军队精神文明建设要走在全社会的前列”的指示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我们在总政首长和机关的指导下，会同全军各大单位组织编写了这套全面反映90年代以来全军重大典型的报告文学丛书《绿色星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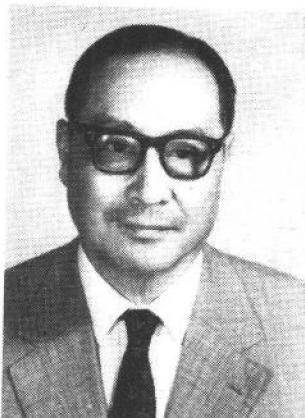
本丛书分为《冷山热血》、《拥抱朝阳》、《倚天铸剑》、《凭潮砺兵》、《长城飞虹》五卷。共收入90年代以来全军及武警部队涌现出来的重大典型94个，以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央军委命名的英模和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的军人为主，一些在全国全军影响重大，尤其是致力于军队现代化建设、面向未来高科技战争研究成就突出的新典型，也由各大单位组织及文化部门认真推荐，慎重入选。

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也是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收入这套报告文学丛书中的英雄模范和先进群体，是一道璀璨的星河，将永远闪耀在共和国的天空。

1997年9月

目 录

姜泗长风格	张晶平 (1)
肝胆照人	彭瑾 (21)
魂留青山	栗薪春 郑健 (55)
植春人	刘灿校 (86)
月亮也从东方升起	烈娃 (117)
君既爱之须纵情	邢景文 (142)
一片赤诚驱病魔	包国俊 (167)
我就是中国	詹少娟 (181)
陶之魂	丛正里 (196)
冰 梦	胡世宗 (226)
腾飞的“火箭”	江永红等 (261)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杨建华 (273)
捍卫军旗之战	陈美林 (300)
殊 荣	吴学陵 (330)



姜泗长风格

●张晶平

—

1993年80岁的姜泗长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教授”的光荣称号。江泽民主席为他题词：“技术精益求精，诲人桃李天下。”

总后勤部做出决定，在机关和直属单位中广泛开展向姜泗长教授学习的活动，并致信赞誉他为“军队医学界的一面旗帜”。

在国外，欧洲耳科协会会长鲍特曼教授则在全法国耳鼻咽喉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这样介绍姜泗长：“这是10亿人的耳鼻咽喉科主席。”

姜泗长教授在海内外享有的声誉，是随着共和国的诞生而悄然崛起的。1950年，他被任命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兼耳鼻咽喉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当时，内耳被视为“禁区”，就在1950年，他成功地施行了我国第一例治疗耳硬化症聋的内耳开窗术，取

得满意的疗效。此后，他发表的有关耳硬化症开窗术的论文被美国耳鼻咽喉科学汇刊收入文献索引中，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

耳聋是我国主要致残疾病之一。新中国诞生之初，我国的现代耳鼻咽喉科学事业有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要做，姜泗长的手下就有不少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相继诞生。1951年，完成国内第一套成人颞骨切片和第一批死婴内耳标本。1954年，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临床耳鼻咽喉科》专著。1962年，姜泗长同他的得力助手田钟瑞在国内开展第一例镫骨底板摘除术获得成功，这是继内耳开窗术后，用以治疗耳硬化症聋效果更好的手术方法，并打破了国外施行此项手术采用全麻的惯例，用局麻成功地施行了此项手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报纸称他们为《打开内耳禁区的人》，文章一发表，轰动全国，给耳硬化症聋患者带来福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都以显著位置用较大篇幅作了报道。《让更多的聋人听到伟大时代的声音》，的确在那个时代激动人心。

从1964年以后，姜泗长作为中华耳鼻咽喉学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副总编、总编辑，他团结全国耳鼻咽喉科工作者积极开展工作，并通过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发现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而为我国耳鼻咽喉科、头颈外科学跟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做出了卓越贡献。

法国著名听生理学家 Aran 教授曾这样对姜泗长说：“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出色，以后我要派人来学习，而不是讲学。”迄今，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参观过姜泗长领导的耳研所，加拿大耳鼻咽喉科头颈外科杂志则定期刊登《中华耳鼻咽喉科》杂志的论文摘要。

江泽民主席盛赞姜泗长“桃李天下”，姜泗长和他的众多学生们的努力，以及他们所影响的中华耳鼻咽喉科学事业，实际上已在世界上，为人类的这项健康事业发生着世所瞩目的影响。

二

爱因斯坦曾在给物理学家索来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特别羡慕你的是：你一定有一种把你的听众的精神激发起来加以培养磨炼的才能，你培养了一群科学的后备军，而我只喜欢独来独往。”当我们注视姜泗长同他的学生，或许会想，姜教授也有这种爱因斯坦所羡慕的才能。

姜泗长的学生是姜泗长的财富。当然，也已经是国家的财富，世人的财富。姜泗长的老师又是谁呢？姜泗长人生的志向、品格以及才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姜泗长的父亲姜世尉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促使姜泗长去学医的却是母亲刘锡佩。

“我的母亲是位勤劳聪慧，节俭持家的家庭妇女，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喜读《本草纲目》，自学中医，能辨证论治，开方治病。”姜泗长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只要说起母亲，姜老脸上就流露出敬佩的神情。他至今还保存着母亲用过的一本《本草纲目》。他的祖辈并没有学医的人，母亲喜好中医，缘于她少时的一场经历。

在母亲小的时候，姥姥不幸得了血崩症，日见虚弱。全家人心情沉重，在给姥姥预备后事了。这时经人介绍请来一位老中医，几服中药下去姥姥的身体奇迹般地恢复了。

这件事在母亲少时的心中震撼很大，从那以后母亲对中医产生了崇敬和兴趣。此后，遇中医来家看病，母亲拿着中医开的药方总要一剂一剂地问个明白。再后，母亲竟去买了一部《本草纲目》，而且竟被她看破了。渐渐，母亲掌握了中医的基本技法，邻里谁有个头痛脑热来找母亲诊治，母亲开出的药方屡屡奏效，在邻里竟有了名声，这给幼年的姜泗长留下很深的印象。

母亲有一种做事很认真、执著的品格。他清楚地记得，上中学时，每天母亲都要一二三地数几个铜板给他吃午饭用，回家后，母亲又要他一二三地详细汇报清楚，当时，他作为中学生，他正处在一个渴求增长自主意识的时期，对母亲是很想反抗的，但又不得不服从母亲认认真真地向她汇报。

由于母亲的影响，他最初选择攻读方向时，想选择中医，母亲却说：“你学不了中医。一服中药不是那好开的，什么季节，什么时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是虚症，还是实症……中医很复杂，你还是学西医吧。”

母亲是他走上医学道路的第一个启蒙者，母亲善于学习钻研，以及认真严谨的品格，都在很大程度上对成长中的儿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从医之后，姜泗长遇到的第一位让他永生感激的师长叫沈克非。他是前中央医学院院长。1997年是沈克非诞生100周年，姜泗长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充满了对沈院长深深的感念之情。

第一次见到沈老是1936年，姜泗长才23岁。沈院长渊博的知识，非凡的气度，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沈院长每星期全外科的大查房，是医生们最紧张的日子，早上8点钟，他会准时出现在病房里，年轻医生要比他更早来到病房做好一切准备工作。他问的所有问题，都要求医生能准确回答。如果回答不上来，他会毫不留情地当众批评，甚至挖苦你。医生们只要发现他从病房的那一头远远地走过来，个个都紧张地整衣正帽，说不好哪一点没做好就会让沈院长抓住，让你当众下不来台。

沈院长很注重医生的仪表，他认为一个医生如果没有良好的

形象，很难赢得病人的信任，在他的严要求下，医生们都要穿着熨得平整的工作服上班。一次，一位医生没有来得及理一头乱发，躲在众人后面，最终还是没有逃脱沈院长的眼睛：“医生有的是凡士林，蹭一点抹在头上。”在场的医生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笑出声来。

皮鞋不亮不行，衣服不平不行，学问不好不行。沈院长全方位地要求每一位在他手下工作的医生。

沈院长严里又透着理解和慈爱，医生们怕他又都很喜欢他。一次住院医生过节聚会，当时任住院医生的姜泗长为了聚会买了两条鱼走在路上。恰巧，沈院长的车开过来，他停下车探出头来问，当知道年轻医生们要聚会时他高兴地说：“我出钱再给你们加两个菜。”并让姜泗长坐他的车一道回去。

1938年25岁的姜泗长忽然患上肺结核，当时这种病九死一生。在日军的进攻下，南京中央医院刚刚搬到长沙，不久又要从长沙迁往贵州，在医院工作相当忙乱紧张的情况下，沈院长对这位患了肺结核的住院医生至为关心，指示有关部门支付了姜泗长的全部费用。

沈克非院长不仅在学问上影响了姜泗长，而且在他人生的非常时期，沈院长对他的爱护和帮助可称恩同再生。

静卧在长沙湘雅医院的病床上，“听着战争节节败退”，青年姜泗长心情郁闷，所幸的是有一位正在这所医院实习的姑娘抽空就来看他，给了姜泗长安慰和温暖，这姑娘后来就是姜泗长的妻子吴幼霖。在湘雅医院姜泗长身体逐渐恢复，紧接着长沙又被日军占领，姜泗长又投奔成都存仁医院的胡懋廉教授，胡老认为姜泗长的身体还不能正常工作，劝他再静养三个月并资助他住进成都结核病院。三个月后姜泗长正式成为存仁医院的住院医生，从此追随胡懋廉教授，选定了耳鼻咽喉科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的终生事业。这是1939年，胡老已是全国有名的耳鼻咽喉教授。

四

今天，姜泗长已被我国医学界誉为“我国现代耳鼻咽喉科的先驱”，这位先驱的恩师却是胡懋廉教授。

如今，在姜老主持的研究所和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人们几乎没有见过胡懋廉老前辈，但在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他完美的形象，一个激励大家为耳鼻咽喉科学发展而奋斗的形象，那是从姜教授的言语中获得的。姜老敬重胡老的为人、学识，一生都怀念他的知遇引路之恩。

“胡老对我影响很大，他不仅教我技术而且教我如何治学，如何做人，他的言行深深地感染并影响着我。这是我一生重要的转折时期。”姜泗长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

年轻的姜泗长自此跟着胡懋廉开始了在这一领域的艰难跋涉。1940年，姜泗长经一位患者的热心介绍，找到了某挖土建房工地，背着麻袋收拾了200多个完整的头颅骨。并收集各种各样的瓶瓶罐罐和各式各样的器械，在一个破旧的屋里摆上了实验台（桌子），从病理科借来一架旧的切片机。在这里，姜泗长在胡老的指导下开始进行解剖训练。“那些标本成为我的一笔财富。”姜泗长说。在这期间他打下扎实的解剖学基础。这间陋室，也就是姜泗长同胡老教授一同建起的中国第一个耳实验室。

同年，胡老在外休养期间，姜泗长忽然被医院解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姜泗长说，“我只好写信向胡老求助。”胡老立刻给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戚寿南写信推荐姜泗长，院长很快指示接受姜泗长，让他继续在存仁医院工作，由中央大学发给薪金。这样，姜泗长就作为中央大学医学院第一位临床助教重返存仁医院做了住院医生。

存仁医院是（中大、华西、齐鲁）三所大学联合组办的医院，

1941年，中大医学院从中分出来，另组建中大医学院公立医院。姜泗长随胡老创办了这所医院的耳鼻咽喉科。“八年抗战中，我一直追随胡老。”从姜泗长使用“追随”二字中，能望见青年姜泗长专心致志地向老师学习的情状。

抗战胜利后，姜泗长回到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全面主持科里的各项工作，此时胡老一家在成都。1947年，姜泗长被提升为副教授，此时医院有五个出国深造的美国援华助学金名额，经院教授会讨论，姜泗长是被选中者之一，但是，必须有胡老来南京教课，姜泗长才可以出国进修。

为了让姜泗长顺利出国深造，胡懋廉老教授举家从成都迁来南京。“我深深地被感动！”有这么好的老师，姜泗长还能说什么呢。

1947年7月，34岁的姜泗长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修。

在姜泗长此后的一生中，从他的求学、科研、医疗以及培养学生都可以看出他的前辈老师对他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是本世纪中国几代从医的知识分子，在国家落后，人民被外国人称为“东亚病夫”的时候，发愤图强的精神在姜泗长的身上得到继承和发扬。

五

孤身在异国他乡不免思念老师和亲人，一天，姜泗长拿出和老师同行们在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教学楼前的夜景照片默默注视，忽然，传来一个美国人惊讶的声音：“你们中国也有电灯？”姜泗长愣住了，美国人这一声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身后的祖国，在美国人的眼里，比实际的落后还要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声问也刺激、强化了他的图强意志。

有一位也受歧视的犹太教授对姜泗长挺友好，劝他学手术回

国后能很快应用于临床，同时又对姜泗长说：“但要发展医学科学水平，还要先学习生理和病理等基础理论。”姜老在他的回忆中说：“这个意见给我很大的启示。”由此，我们也能看见，姜泗长的留洋之旅，将主要从美国带回什么。

1948年12月，姜泗长谢绝导师林则教授的挽留，搭乘商货船，历时20余天回到祖国。当时，国内正打淮海战役。不久南京解放。中央大学医学院被解放军接管，改为南京大学医学院。原来的院长出走，经院“护校委员”民意测验选举，姜泗长被选为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同时兼耳鼻咽喉科教研室主任。不久，医院又改名为解放军第五军医大学。在这期间，他又建起了一个六平方米的实验室，虽然小，但在这间小屋里，他开始带着学生田钟瑞、李琦做内耳、中耳、外耳的模型。

建一个理想的实验室直至研究所，是他此前就有的愿望。“不管条件多艰难，一定要把实验室搞起来。有了实验室，咱们的教学就有基地，医疗才有理论做指导。”胡懋廉老教授是这样对他说的。他赴美国深造获得的经验和体会也是这样告诉他的。然而，此后由于工作调动以及历史的原因，建一座理想的耳研究所却成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一件相当艰难的事。

1954年由于第五军医大学和第四军医大学合并，姜泗长调西安做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咽喉科教研室主任。其实，西安第四军大附属医院是在一片荒野中开始建院的，经五年艰苦奋斗，医院逐步走向正规化系统化，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西安知名度最高的一所医院，一间20平方米的耳科实验室也趋于完善，正当事业蓬勃发展之时，由于沈克非院长的推荐和介绍，姜泗长又于1959年被调往北京解放军总医院任耳鼻咽喉科主任。姜老回顾说：“若说四医大开始时是个乱摊子，而总医院则是个一穷二白的穷摊子。”

当时总医院的耳鼻咽喉科是一个小科，和妇产科合为一个病

房，只有 13 张床，五名医生。没有办公室，更谈不上实验室，只能做扁桃体和鼻息肉一类的小手术。姜泗长也曾陷入深深的苦恼，思想深处时时闪着再回西安的念头，并去信向胡老诉说内心的苦恼，胡老回信说：“我相信你有能力有毅力重新开始，有志者事竟成。”胡老身上强大有力的人格力量再一次深深感染了姜泗长。

六

姜泗长深深懂得要提高医疗质量，一定要有科研做后盾，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是临床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他开始了艰难的再度创业。

在一间 11 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姜泗长开始筹建解放军总医院的第一个实验室。到 1962 年，实验室扩大为 36 平方米，1964 年再度扩大为 70 平方米，此时实验室已在军内外产生一定影响，来此进修的专科同行逐渐增多，姜泗长的学生也由此开始遍及军队和地方许多医院。他们在这里学习病理、学习手术，回去后，大都成为本单位的学科带头人。

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姜泗长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他被隔离审查、批判了八个月，姜泗长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写道：“到出来的那一天，我还是没搞懂什么是资产阶级医疗作风，什么是无产阶级医疗作风。”

1974 年姜泗长被军委派去中央保健组工作，从这年 12 月 4 日到 1976 年 9 月 9 日这一段时间，也是姜泗长人生旅途中的重要时期。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主席不知疲倦地学习和工作的情况。毛主席读书之多之快记忆力之强是异常惊人的。毛泽东对他产生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力。

在为毛主席看病的过程中，主席经常问起一些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方面的问题，而且非常巧妙地引入医学领域，毛主席

的话总给人以出乎意料的启示，能有机会亲身感受毛泽东深邃的思想和独特个性也是姜泗长一生中的幸运。

毛主席逝世后，姜泗长又回到总医院耳鼻咽喉科工作。姜老说：“回顾文革十年，那段时间的经历和各种批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经常的回忆。”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划时代的科学盛会，姜泗长荣幸地坐在主席台上，有幸亲耳聆听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同年，姜泗长被任命为总医院副院长。自此，他领导的耳鼻咽喉科，分别于1978年和1985年成为国家教委批准的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点。1978年，他招收了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86年他招收了第一个博士生。1996年他所领导的耳鼻咽喉科被国家教委批准为博士后流动站。

1986年癌细胞夺走了他四分之三的胃。手术后，在病榻上支撑着十分虚弱的身体，向院党委写了一份报告：我一生想做两件事，一是治聋，二是建立一个耳鼻咽喉科研究所。治聋我已经做了一些事，在有生之年建立一个研究所是我一生的夙愿。

他的愿望得到了院党委和总后勤部首长的支持。1987年，总后勤部批准建立耳鼻咽喉科研究所。

1990年耗资100万元的我军第一个耳鼻咽喉科研究所，终于在解放军总医院绿荫环绕的高楼群中竖起。4月26日对他来说是个格外激动而不能忘怀的日子，他大半生孜孜以求的研究所在这一天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

原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政委周克玉等总部首长和总医院的专家教授及其他医务人员来到新建的研究所楼前参加了庆祝活动。

虽然落成的是一座新楼，却是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心血！在这样的时刻，他想起了他的老师，想起了他的同事，想起了为事业

过早离开人世的学生。在千人典礼上，姜泗长热泪盈眶地说：“在几十年的艰苦创业过程中，我要感谢曾和我一起工作过的李琦教授和已故的田钟瑞副教授，我们不能忘记为研究所的建立建成付出过汗水的每一位同志。”

1962年，经过一番周折，姜泗长把学生田钟瑞从四医大调来，田钟瑞为人忠厚，是医、教、研都非常全面的人才。在60年代就是姜泗长的得力助手，师生为开拓耳鼻咽喉科事业携手创业，结下了很深的情谊。不料田钟瑞因心脏病突发溘然而逝。在抢救学生的日子里姜泗长始终守候在他的床前。老师痛哭学生的场面，使许多人一同泣下。姜老的另一位高足杨伟炎说：“我从姜教授那里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师生情谊。”在姜老的提议下，田钟瑞的遗像一直悬挂在耳研所里。

七

从那时至今，又过去了许多年，姜泗长所领导的耳研所在国内外产生的影响，被人们誉为一座耳鼻咽喉科的科学大厦。然而，比这更辉煌的是姜泗长潜心培养的一大批学生，那是一座人才的大厦。

1984年，姜泗长把46岁的杨伟炎推上了耳鼻咽喉科科主任的领导岗位，此举在当时堪称惊人之举，这不仅因为是让杨伟炎来接替姜泗长的科主任之职，也因为杨伟炎比当时各科室的主任都年轻得多。

杨伟炎行吗？人们议论纷纷。

“我当教授时才34岁，不能论资排辈，谁有能力谁上。”

杨伟炎由此成了“当时全院最年轻的主任”。为了让杨伟炎更有经验更有资历，姜泗长又决定让杨伟炎先出国考察学习。杨伟炎在任科主任不满一年时，又成为被姜泗长送到美国去进修的第一